

八、得意洋洋的扩大和自由化的起伏

1. 景气迅速恢复及其原因

所谓“锅底景气”正象它的名称本身所显示的那样，取得经济回升需要经历相当长的时间。结果在低点爬行约一年时间，所谓锅底景气才告结束。从1958年秋开始，景气在各个方面都出现活跃迹象，到1959年春就转为全面活跃，以后一直保持上升的势头。

1957年危机时景气下降得比较轻微，前面已有叙述，而比较快地转为上升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有库存投资方面的原因。库存的下降大约是从1957年年中开始的，降至一定限度之后，生产和销售便一点一点增加，因此，企业从1958年年末开始增加库存，进入1959年后库存又进一步急剧增加。

其次是出口增加。到1959年上半年，出口增加得特别显著。大部分是由于对欧洲的出口增加，特别是对美国的出口剧增。包括下半年在内的一年期间，出口总额比上年增加了20%，其中的75%即四分之三是得自对美国出口的增加。1959年对美国的出口比上一年实际增加71%，结果是这一年的对美贸易在海关统计上入超仅约六千九百万美元，在外汇统计上竟出超一亿多美元。日本对美国大体上每年都有巨额入超，入超的剧减或出现出超，这在停战后还是第一年。

在日本陷入“锅底景气”之际，欧洲主要国家并未发生危机，它们或者是景气停滞，或者象西德那样呈现缓慢的上升。相反地，美

国在日本因外汇危机而紧缩金融之后就发生了生产过剩危机。此后，美国的景气经历了V字型的过成，从急剧下降转为迅速上升，于1959年春结束复苏过程后便持续地急剧回升。这种景气好转正是日本对美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美国在景气好转时增加进口的商品多数来自日本，如半导体收音机、照相机、胶合板、玩具、纺织品、钢材等大半是从日本进口的。

以美国景气上升为主要原因的出口剧增，使日本1959年的出口总额达三十四亿美元，终于恢复到战前水平（1934年到1937年的平均数）。在恢复到战前水平方面，出口比进口迟了三年，工矿业生产迟了九年。但是，这一年出口的大幅度增加，不能不说是日本景气提前回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与出口增加有同样意义的是生产的增长。必须提到的主要情况是汽车、电视机、电动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及其生产的显著增长。到1959年下半年，设备投资急剧增加，随后对资本货物机械的需求及其生产也在扩大。这样，耐用消费品和资本货物两个领域的机械的生产在生产的扩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种产业向高级阶段发展的趋势，成了这一时期景气上升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一般认为，日本工业如果没有这种意义上的高级化便不能发展。由此，1957年到1958年间一度发生的设备过剩状况，在短时期内就消除了，1959年并再度出现设备投资扩大的趋势。于是以机械工业的大幅度增产为主导，1959年的工业生产全面地大规模增加。从通产省发表的生产指数看，制造工业综合指数比上年有显著增长，增长率为26%。增长率最高的还是机械工业，例如机械工业综合指数的增长率为44%，电气机械工业为72%。这一年机械工业生产的增加约占整个工矿业生产增加部分的一半。

1959年的工矿业生产和国民收入，虽然没有达到朝鲜战争爆发那年1950年的水平，但是超过了神武景气的1956年，增加比率

很高，因而国际收支非但未出现逆差，反而取得了四亿八千万美元的盈余，整个物价也仅有少许上升，没有发生所谓景气过热现象。其原因是，生产设备尚有余力；劳动力还有剩余，特别是没有感到不足；没有出现引起进口剧增的情况；金融从一开始就有紧缩的迹象，政府和日本银行采取了抑制信贷和提高公定利率的方针，及早地制订了调整景气的政策，等等。

进入1960年后，在上半年出现了若干景气停滞的迹象。这是库存投资已经完成一轮和对贸易外汇在日本开始自由化有所疑虑所引起的。阻止修订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恰好在这时进入前所未有的高潮，全国处在大规模示威游行和以国营铁路工人为中心的大罢工的风涛中。在广大人民“反对安保，打倒岸信介”的要求下，岸内阁被打倒了。这个时期也从这时开始（1960年7月）大致结束。代之而起的池田内阁为准备大选，作为恢复保守政权声誉的政策，以低姿态伪装自己，为恢复名誉和发展垄断资本，提出了哗众取宠的“收入倍增计划”和“高速增长”政策。

2. 收入倍增计划

池田首相的亲密朋友一桥大学教授中山伊智郎提出，日本在1958年末同西欧各国恢复货币兑换关系（象过去一样，本国货币可与外国货币自由兑换）后，必须同经济迅速发展的西欧各国进行竞争，这就要从根本上改善日本的经济体质，并且要改变想法，把工资提高一到二倍，否则是不行的。当时担任通产大臣的池田采纳了这个建议，到处提倡“月薪倍增论”。

实际上，在1959年日本经济顺利而大幅度地发展之后，为使经济能够持续地这样发展，在岸信介内阁时已经从1959年末起着手制订以国民收入倍增为目标的长期计划。

不久，由于修订安全保障条约，岸内阁下台，池田内阁上台了。

池田首相急忙提倡以迅速扩大经济为方针的收入倍增。因为池田曾经提倡“月薪倍增”，此时国民当中有不少人误认为收入倍增就是月薪一下子要增加一倍。对于政府和自民党来说，这种误解也许是一种意外的幸运。实际上正如后面说明的那样，即使在十年以后，收入倍增计划也未使月薪或工资水平平均增加一倍。

池田首相十分顽强，他要求制订中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尽可能提高经济增长率（这是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近似于国民收入增长率），尤其强烈主张将最初三年的增长率设想为最高水平。池田首相非常乐观，他认为日本经济完全能够迅速增长，而且一旦迅速增长，日本经济的弱点与问题就迎刃而解。但是企划厅的主管官员反对制订过高的增长计划，他们认为要使经济持续增长，当前需要的不是高比率增长，而是大规模地改变产业结构，一句话，就是必须坚决推行结构改革的政策。

当年（1960年）12月末，内阁会议决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目标是，按1958年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要由1960年度的十三万亿日元，到1970年度达到二十六万亿日元，即十年实际增加一倍。池田首相代表的一部分垄断资本的乐观见解，成了这一目标的基础，最初三年的经济增长率定为年率9%，大大高于十年的年平均增长率7.2%，让池田首相来说，这样的幅度实在过低。

可是，如果简略回顾一下战后日本制订的资本主义经济计划，可以看到多少具备规模的最初计划，是1947、1948年以社会党为首的片山内阁及其后的芦田内阁所制订的经济复兴（五年）计划。这是为了复兴经济，以要求美国援助为最大目的而着手制订的，但是在计划最后决定之前，碰上了美国政府强制要求日本推行道奇路线，这个计划终于被束之高阁。

在这之后的吉田内阁期间，醉心于自由经济的吉田首相认为“计划经济是赤色的”，因而不太关心经济计划，在其“长期政权”之

下只制订了一项“自立三年计划”，但它也因爆发朝鲜战争，在经济动荡中消失。1955年鸠山内阁制订了“经济自立五年计划”。由于第二年神武景气的出现，经济取得了超过预料的发展，因而计划与实际状况相去较远。1957年末再次制订了“新长期经济计划”，提出了更高的经济发展目标，以1962年为计划的最终年度，计划可提前二年完成。

如上所述，正是充分考虑了1959年度出现的意外强烈的经济发展势头，重新制订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提出了十年后的目标。这个计划是日本战后经济计划中规模最大的，计划编制手法也较过去为好。例如，将政府公共部门和民间部门分开，对前者强调计划性，对后者则确定采取预测和诱导的立场。而且不单纯罗列数字，而就完成计划所必要的政策提出见解。

但是，对于一个综合性的长期计划来说，即使在社会主义经济下问题也非常多，在以无政府生产和对立的分配为基础的、以资本之间的竞争为原则的资本主义经济下，情况更是如此；在这种经济下，虽说多少可以执行计划，但毕竟难以完全实现。必须认定，在这种计划中列举的大略方针，恰如其分地表露了垄断资本的意图。至于计划细目罗列的很多象是真的数字，不过是多余的装饰，这样说也不算过分。

基于这样的理由，在此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详细的计划数字，这一计划所涉及的广泛内容，也只有予以省略，但是为了避免误解，我们就计划的基本点在第11表中举出了简单的数字。从表上可以看到，十年间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而人均国民收入却没有实现倍增，工资水平比这更低，仅增加零点六五倍。

在产业活动中，工业生产有较大的增长（约增加二倍），在工业中机械工业生产的增加最为显著（约增加二点九倍），重化学工业所占的比率，1960年是63%，十年后上升为73%。相反，农业的地位

显著降低，十年间，生产约增加三成，而农业就业人口估计将减少约三百二十万人，约减少四分之一。

第11表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十年增长率

(1970年同1960年相比)

| | |
|------------|---------|
| 国民生产总值(实际) | 增加1倍 |
| 国民收入(实际) | 增加1倍 |
| 人均国民收入(实际) | 增加0.84倍 |
| 工资水平(实际) | 增加0.65倍 |
| 工业生产 | 约增2倍 |
| 农业生产 | 约增0.3倍 |
| 农业就业人口 | 减少23% |

(政府发表的数字大体上是以1956—1958年的平均数为基础的，因此所提的增长倍数，非常容易出错。)

在制订倍增计划方案时，除上述增长率外，还存在着各种对立的意见。其中关于农村就业人口减少到什么程度的看法，分歧最大。过去，政府和自民党害怕农民和农业团体反对，不敢公开提出减少农业人口的政策。池田首相则不同，他断然地说农业人口十年后要减至三分之一，以后改为减少四成。池田首相满不在乎地说出这样的话，可以说是忠实地代表了垄断资本的见解。垄断资本或现代产业的急剧发展所带来的农业分化是太明显了，已经不能再蒙混下去了。另一方面，由于来自农民方面的强烈反对，以及政府内部也有一些反对意见，故在倍增计划中，如上所述，大体确定将农业就业人口缩小四分之一。

不限于这几点，整个计划是以垄断资本的立场为中心的，可以说是很好地表明了垄断资本的扩张欲望，但是在经济这样连续大幅度扩大的时候，果真不发生物价特别是消费物价的猛烈上升吗？在这一点上问题很大。在这种情况下，稳定物价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十年间消费物价大幅度上涨，而实际工资水平十年间只有65%的微弱增加，这种增加岂不是很简单地就被物价的上涨淹没

了吗？同时，这个计划始终只是罗列积极的一面，对于在已经实行贸易外汇自由化的过程中它的不利的一面和扰乱作用，几乎未予考虑，这是必须指出的重大缺陷。

3. 贸易、外汇的自由化

对于日本经济来说，这时期还有一项必须指出的极为重要的经济政策，这就是贸易、外汇的自由化政策。

日本在从战前到战后的长时期里，都进行了贸易管理和外汇管理。对外贸易和外汇交易由国家控制，不能自由进行。战后也长期保持这种状态，主要原因是国际收支极其不稳，外汇储备很少，如果不进行贸易和外汇的管理，无论如何也维持不下去；同时，在同外国的竞争中，贸易和外汇的管理制度，是保护并发展比先进各国落后的国内产业和垄断资本的极为重要的手段。而且，西欧许多国家也以同样的理由，对贸易和外汇交易进行若干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西欧各国对日本的作法当然不会说什么，连主动实行贸易和外汇自由化并要求别国也实行的美国，也未对日本说什么特别挑剔的坏话。

因此，就1955年上半年购进商品的外汇预算来看，其中大部分用在外汇配额商品项目上，用在自动批准制即自由化的商品项目上的部分所占比率不过是16%。日本垄断资本尽可能地一边保留贸易和外汇的管理制度，一边在这个制度的保护下使自己在短时期内得到很大发展。

但是，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的各国自1949年以来，已陆续实行相互间的贸易自由化，在1958年末恢复通货之间的兑换关系时，从该组织域内国家进口的自由化率，占域内各国进口总额的89%，到1961年末，域内工业品贸易几乎完全自由化了。这些国家从美元地区(特别是从美利坚合众国)进口的自由化，随着

经济好转和外汇储备的增加,从1954年起终于有了进展。

另一方面,美国在1957年也爆发了经济危机,为摆脱危机而实行的通货膨胀以及垄断价格的提高,导致了物价上涨,从而美国商品与经济继续发展的西欧商品相比,与工资低而劳动生产率相当高的日本的廉价商品相比,其国际竞争力减弱,以致出口急剧减少,进口大大增加。加上巨额的对外军事支出,国际收支显著恶化,因此美国从1958年开始的黄金外流,一直没有停止,黄金储备连续减少。

于是,美国强烈要求欧洲各国实行自由化。欧洲各国考虑了这种要求,以出口连续增加所扩大的外汇储备为基础,恢复了通货之间的兑换关系,其结果促使从美国的进口使用美元的歧视性限制得以消失。这样,参加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各国对美元贸易的自由化率,在1960年增加到86%,接近于域内贸易自由化率的水平。于是欧洲各国贸易和外汇自由化的进度,远远超过了日本的预想。

虽然从1959年起日本景气回升,但其国际收支并未恶化,外汇储备在1959年年中增加了约四亿美元,到年底达十三亿六千万美元。国际收支好转了,而对贸易和汇兑仍然实行严格的限制,以保护国内专业,从而取得了远远凌驾于各国之上的经济增长速度,对此欧美各国当然不会默然置之。在这一年美国从日本的进口又增加了约五成,日本本身继续对进口实行严格的限制,特别是对从美国的进口实行歧视性的限制,这是很成问题的。

果然,美国从1959年开始强烈要求日本实行贸易、外汇自由化。当年年初它就特别强硬地要求撤消二百三十一个商品项目的进口歧视。从此日本政府逐渐放宽贸易限制,特别是以关税贸易总协定1959年10月的东京大会为契机,开始将自由化政策具体化。1960年1月,岸首相为签订新的安全保障条约出访美国,政府利用这个时机确定了推进贸易、外汇自由化的基本方针,

并应美国要求，对许多商品项目实行自由化。有人认为这是岸首相访美的礼物（就在此时，全日本学生联合会学生静坐羽田机场，企图阻止岸首相访美）。接着，日本政府背着国民，于1960年6月23日暗中交换了新安全保障条约的批准书。条约生效的第二天，便决定了“贸易、外汇自由化大纲”。大纲的主要内容是将贸易自由化率（1959年时的自由化商品项目进口额在同年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率）由1960年4月的41%到三年后的1963年4月提高为80%（石油、煤炭自由化时要达到90%）；外汇的经常交易原则上在二年以内自由化；对资本交易也逐渐放宽限制。岸首相在其临别礼物新安全保障条约上，又添加了这一份礼品，在这之后二十天就下台了。

这就使自由化的暂时日程大体上具体地定下来了。正式的自由化终于进入决定时期，在这前后，国内产生了不安之感。政府和垄断资本就自由化进行了种种宣传。围绕着自由化问题产生了种种议论。政府和垄断资本一致认为自由化非常好，首先，自由化可以为日本市场提供价廉物美的商品，可以使贸易兴旺、产业发达，促进企业的合理化和体质的改善，如不进行自由化，日本则将被排斥在世界市场之外，被孤立起来，或者与世界的进步背道而驰。这些话与接受MSA（相互安全保障法）援助和提高生产率运动时的宣传基调，颇相类似。多数议论认为自由化是“外力”和“内因”交互作用的结果，是美国和垄断资本使日本进一步从属于美国的野心的表现，是日本垄断资本为同外国对抗而采取的自发性的发展政策。自由化确实有这样的一面，即它是参加联合国的资本主义各国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集团经济的教训，为建设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新秩序而提出来的。但是必须说，自由化对发达国家直接起确保和扩大其商品以及资本的海外市场的主力作用；同时，对竞争落后的国家，即以管理贸易和外汇的保护措施来促进国内产业

积极发展的国家,起着消除障碍、扩大国外市场的主力作用。推进自由化的主体是美国垄断资本。自由化不仅有积极扩大市场的一面,而且有保卫自己的一面。在最近时期,要求自由化的已不单单是美国垄断资本,欧洲各国垄断资本也加入了要求日本自由化的行列。欧洲各国一边处在被要求自由化的地位,一边也明显地加强相互间的协作关系,以对抗美国。欧洲多数国家都倾向于以缓和与撤消对日本廉价商品的进口限制作为交换条件,强烈要求日本实行自由化。

这样,不仅美国一国,而且大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推行了自由化。日本处在被要求实行自由化的地位,它既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之一,作为垄断资本,毕竟不能从思想上拒绝自由化。所以日本不得不在不致遭到重大报复的限度内,尽可能地暂时保留贸易和外汇管理,以加强国际竞争力薄弱的部门。在这个前提下,极力促进经济发展,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地从具有实力的部门开始实行自由化。对于处于优势地位的个别资本来说,它如其反对自由化,还不如以实行自由化为前提准备条件,以确保其在国内其它资本的竞争中的优势地位,而不成为落伍者。这样,只有因自由化而较多资本遭受打击的产业部门,才主张反对自由化。

在池田内阁制订倍增计划,提出积极的方针时,个别垄断资本开始认真制订自由化对策。同时,政府也制订了自由化计划,结果之一,就是欧洲的短期资金欧洲美元,为追求日本的高利率,在1961年上半年集中源源流进日本。进入1961年时,尽管进口激增,贸易赤字急剧扩大,但非贸易收支由于巨额欧洲美元的流入而出现盈余,外汇储备连续增加,到4月已超过二十亿美元,创最高纪录。是年后半期,外汇储备又形减少,在尚未剧减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日本政府举行了例年的协商会议。因为此时日本经济正在迅速发展,外汇储备大幅度增加,政府担心会议可能认为日本

没有继续进行外汇管理的必要，将劝告日本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八条国家过渡，而不再根据国际收支方面的理由继续进行贸易和外汇限制。因此，政府一再恳求延期提出这项建议，作为交换条件，拟于1963年4月将贸易自由化率提高到80%的预定，提前半年于1962年10月实行，并将预定的自由化率提高到90%。

这样，政府使自己陷入了既担心贸易和外汇自由化、又将预定的自由化提前实行的矛盾之中。

4. 外资蜂拥而至

战后，日本在正式实行自由化之前，在经济由恢复到积极发展的时期，一直依靠贸易管理、外汇管理和外资法等，防止外国商品和资本拥入国内市场，从而保护和培育了国内的商品和资本，特别是扩大了国内市场。这是战后日本经济急剧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

但是，绝不是说，日本垄断资本和政府反对引进外资。一般地说，日本既强烈希望引进外资，又对外国私人资本对国内的每一笔投资，保持相当警惕的态度。主要是担心外国的强大资本一旦直接进入日本，国内的有关公司将被夺走或压倒。日本制订的外资法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将这种不受欢迎的外资拒于门外，同时，它规定对于引进的外资尽可能给予保障，以吸引那些“受欢迎”的外国资本。对于来自外国的参加经营的股份投资和同日本企业共同设立合办公司等，虽然也不表示拒绝，但倾向于欢迎没有夺走经营权危险的外国技术援助和贷款投资方式。前面已经提到，关于这一点，美国商务部在1956年的一份调查报告中也是这样写的：“日本对外国人参加经营乃至管理的直接投资是担心的，比较希望技术合作与贷款。”总之，作为外资引进的，有美国援助等政府间投资，在私人投资方面有称作间接投资的贷款投资，还有这两者之间

的世界银行贷款等，以及技术援助。日本的方针是，多接受借款和技术援助，限制原材料以外的外国商品、特别是非必需的商品的进口，以保护和培植国内的产业和资本。

在保护和培植国内产业的格局尚未撤消期间，从自由化接近正式实施的1960年起，日本为迅速增强竞争能力而引进的外国私人资本特别是贷款、技术，迅猛增加。引进的技术自1960年起、贷款投资自1961年起、外汇债券自1961年起都急剧增加。随着日本经济发展速度加快，资本交易的自由化也逐渐取得进展，所以来自外国的股份投资在1960年后也急剧增加，外国公司取得日本公司股份、参加经营的情况，在1960年和1961年都大幅度增加。以往提供技术援助，得到专利费就大体满意的外国资本，利用外资法的执行随自由化的进展而放宽的机会，或以提供更先进的技术为条件，要求参加经营的情况也增多了。此外，外国资本为迅速打开产品的销路，国内外资本设立合办公司的情况，随着自由化的进展，自1960年起也迅速增加(参看第12表)。

这样，随着自由化的进展，从外国引进的技术和资金以及外国的直接投资等，都急剧增加。这一趋势是与经济的迅速发展相联系的。那么，迅速增加的外国投资究竟有多少？完全准确的数字是没有的，据1956年美国商务部发表的概略数字，这一时期日本引进的外国私人投资总数为四亿四千七百万美元，包括技术援助投资在内，约占全部私人投资的三分之二。截至1958年9月末为止，根据笔者试算，外国(均指美国)的政府投资约六亿美元，私人投资约十亿美元(其中，资金投资四亿七千万美元、技术援助五亿六千万美元)，包括其他合计达十八亿多美元。粗略估算(参考数)，截至1961年度末为止，外国对日投资总额约达二十五亿美元，其中政府投资六亿美元，私人投资十九亿美元(其中资金投资十亿多美元，技术援助八亿多美元)。最近私人投资大大增加，特

第12表 外国私人资本的引进情况

(金额单位: 千美元)

| | 外 资 实 际 引 进 额 | | | | 技术援助合同 的批准件 数 | 主要合办公司 设立件 数 |
|-------|--------------------|----------------------|------------|----------------------|---------------------|--------------------|
| | 股份投资 | 贷款投资 | 外汇债券 投资 | 包括其他的合计 | | |
| | (50年) (3,150) | | | (50年) (3,150) | (50年) (27) | |
| 1951年 | (51年) 11,855 | 1,809 | | (51年) 13,664 | (51年) (101) | 17 |
| 1952年 | 6,554 | 9,264 | | 15,922 | (133) | 18 |
| 1953年 | 6,959 | 16,937 | | 24,206 | (103) | 13 |
| 1954年 | 4,803 | 38,992 | | 43,852 | (82) | 8 |
| 1955年 | 2,505 | 60,877 | | 64,235 | (72) | 1 |
| 1956年 | 7,685 | 71,205 | | 78,990 | (144) | 7 |
| 1957年 | 11,153 | 95,860 | | 107,154 | (118) | 9 |
| 1958年 | 11,297 | 137,461 | 30,000 | 178,901 | (90) | 4 |
| 1959年 | 26,819 | 123,791 | | 150,860 | (153) | 10 |
| 1960年 | 45,649 (74,855) | 136,012 (128,199) | 9,800 | 192,228 (213,428) | (327) | 20 |
| 1961年 | (116,142) | (387,605) | 72,425 | (577,529) | (320) | 25 |

(备注) 括弧内为根据外资法批准的数额。技术援助合同数和外汇债务投资据大藏省的调查。

主要合办公司设立件数据经济企划厅的调查。

此外均据日本中央银行的调查, 只合计一项有补充。

别是贷款投资、其次是股份投资显著增加, 技术援助也大大增加了, 在私人投资中占近一半。引进外国技术的件数, 根据外资法批准的情况看, 战后到1961年为止, 达一千六百七十件。工业部门的大企业, 几乎没有不从外国引进技术的。西德、瑞士等欧洲国家的技术援助也在增加, 但美国占绝大多数, 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值得注意的是产业机械部门的技术引进件数最多, 以下依次是收音、电视等通讯机械、有机无机化学药品、汽车等运输机械以及金属等部门。

从日本中央银行发表的材料来看, 从1958年到1962年外资引进额共达十六亿六千万美元(到1961年为十亿九千万美元, 都

不包括技术援助，股份投资只限于参加经营者)。其中，从部门来看，石油、金属、电力、运输通讯等部门引进的最多，其次是机械、政府机关等，以上各部门合计达总额的87%。与前一个时期相比，机械工业、特别是化学工业部门的引进所占的位次降低了。按国别看，在上述期间，美国为参加经营而进行的股份投资占67%，一般贷款投资占80%（不包括世界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的部分），仍占绝大多数。

5. 中小企业问题和中小企业的工人运动

在占领时，美国政府完全没有把日本的中小企业放在眼里，对日本的中小企业问题也不能理解。这对美国大垄断资本的政府来说，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美军司令部虽然制定了暂时削弱财阀的占领政策，却几乎没有制定一项积极援助中小企业的政策。不仅如此，正如道奇路线所明显表露的那样，它们还把中小企业视为完全无用的杂草一类东西，尽可能加以整顿或者放任不管。

道奇路线使中小企业受到很大打击，多数中小企业遭到整顿而破产。朝鲜战争爆发后，随着垄断资本的迅速恢复和加强，其与中小企业的差距日益扩大。于是垄断资本对中小企业和承包厂的控制迅速加强，系列化也引人注目地开始发展。中小企业工人和大企业工人的工资差别，自1949年道奇路线时起到1952年为止的期间大幅度扩大了。

而且，政府在这期间，采取了加强垄断资本的各种政策，但对中小企业的困难，占领军采取极为冷淡的态度，垄断资本除对自己有间接利益者外，也没有采取什么对策。在朝鲜战争景气消失、困难重重的情况下，自解除占领时开始，中小企业便集结力量，提出要求，对抗垄断资本和政府的声势逐渐扩大。中小企业的团结并不容易，所以这种活动没有迅速展开，虽然如此，其声势还是逐渐

增强了。依靠各种中小企业团体的活动能力，不久便制订了有利于中小企业的政策、法令。

举其要者，首先是“中小企业安定法”。这个法律是1952年为救济陷入十分困难境地的出口中小企业而临时制定的。这些中小企业特别是经营出口的中心工业，对垄断资本来说是获得外汇的重要产业，所以对它们的救济才被放在优先地位。1956年，根据反对百货商店迅速扩展的中小零售业的要求，又制定了“百货商店法”。虽然这项法律在内容上还不能满足中小业者的要求，但总算对百货商店的新设和扩展多少有所限制，在这一点上是值得注意的。

其次，在1957年向国会提出了“中小企业团体组织法案”。这个法案的目的是谋求中小企业的团结，改善中小企业的地位，使之能与大企业相对抗。其实这是一部分垄断资本家、中小企业团体的头子、自民党、官僚等之间的私下交易和妥协的产物，与社会党也有些关系，与当初的宣传相比，内容极为模糊。就是这样的东西，也遭到纺织协会和经团联这样的垄断资本团体的强烈反对。自民党和社会党（当时社会党和民社党尚未分裂）内部对这个法案也分为赞否两派，结果在众议院审议时，由于工会出身的社会党议员和与金融垄断资本有关的自民党议员的猛烈反对，这个法案未能通过。这项法律在删去主要部分后，于次年1958年获得通过，但是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它们的期望完全落空。

关于中小企业的工人运动问题。日本中小企业的工人运动在战后被占领期间，也是极为低沉的。与其说是低沉，不如说在工人运动中实际上是处于几乎被无视的状态。在战后的工人运动中，中小企业工人在参加人数上遥遥领先，在今天工人运动很明显是以大企业的工人为中心的。

1954年6月，近江丝绸工厂发生了罢工。这家公司是名列十

大纺织公司之后的大纺织企业，在战后成了大公司，它的总经理在经营上极端独断专行，对工人坚持严酷的陈腐做法，完全无视工人的权利。工会终于提出“人权要求”，举行了罢工。对此，不仅工会组织进行了全国性的支援，而且社会舆论也对该公司违背人道的做法表示不满，强烈支持“人权罢工”。罢工经历了很长时间，总算以工会方面的胜利而结束。过去这家公司虽说是大企业，但是同中小企业大量呈现的情况有非常类似之处，而且“人权罢工”是工人方面的胜利，所以引起了处于同样情况的中小企业工人的注意，使他们受到了鼓舞，中小企业的工人到处成立工会，举行罢工。这样，近江丝绸厂的罢工，对战后日本中小企业的工人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时，以大企业为中心的工会运动比较低沉。这是因为，大企业的工人大部分已经组织起来，加上企业增雇的工人不多，所以工会会员难以大幅度增加，加上在通货紧缩的情况下，基本工资根本不能提高。也因为在这个时候，为了打开这种困难局面，工会开始把注意力转到组织中小企业工人和展开中小企业的工人运动方面。特别是总评从1955年起确定了在中小企业扩大运动的方针，此后中小企业的工人运动较受重视，中小企业的工人运动也多少地活跃起来了。

可是，要把中小企业的工人组织起来，在中小企业的工人中开展各种活动，需要极大的耐心和热情。另一方面，历来的大企业中心主义和以企业为单位组织工会的倾向，不容易简单地加以改变。因而，对大企业的工会真正认识中小企业工人运动的重要性并予以支援，不能寄予太大的希望。以后的情况也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今天在日本，说到底，困难再大，也只有在中小企业才能开展符合工人运动的活动，而且在那里开展工会运动也最有必要。然而实际上，中小企业的工会运动并不出色，发展也不快，主要是依靠

自己的力量逐步前进。

与中小企业工人运动相关联的问题是最低工资制。关于这个问题，以往有过种种议论。我们不在这里叙述这些议论，但有一点必须说一下。这就是，正如许多人至少曾经说过的那样，最低工资制不单单对中小企业的工人是重要的，对全体工人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当时对这一点的理解还比较肤浅。正是因为这样，工会在开展中小企业的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把获得最低工资制作为工人运动的一个支柱提出来。当时，先由政府和本方面酝酿，然后根据企业经营者之间的协议，于1959年制定了排除工会参与决定最低工资的似是而非的“最低工资法”。（据说适用最低工资法的工人1961年度末约一百四十万人，1963年6月末约二百三十万人。）这一最低工资法是相当苛刻的，连政府也认为有改善的必要。工会方面认为，如不从根本上修改最低工资法，最低工资制便不能指望在最近的将来得到实现。

6. 合理化和工会

合理化活动，当时在企业内部、产业部门、进而在全产业都在进行。这是因为：第一，技术在不断进步，过去的技术已经落后，日本企业正在积极引进新的技术；第二，与此相关联，产业结构的变化，引起了产业和企业的改组和整顿；第三，与此相结合，自由化进展迅速。

关于合理化的涵义，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见解。特别是就其对工人的影响来说，从以上三点来看，合理化的要点，在于增加工作量与减少雇佣人员。削减人员的结果是：解雇、更换工作岗位、加强劳动强度、严格车间纪律、侵害工人的权利、增加对工会活动的压迫、削弱工会，以及在工资方面引进职务津贴等等。

当时部门和企业界合理化的明显倾向，可分为以下几类。第

一，由于采用新技术而发生的合理化，其代表者是电信电话公社，造船、摩托车等部门也可以视为属于这类情况；第二，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所引起的合理化，其代表者有人造丝、毛纺、麻纺等部门；第三，就是由于自由化而引起的合理化，铜、铅、锌、水银等有色金属矿山部门是这种情况的代表。其他，涉及第一、二、三者的有煤矿业，涉及第一、二者的有硫酸、棉纺、铁路（国营）等，涉及第一、三者，自由化比重大的有汽车、汽车零件、纸浆、钢笔等部门，此外，石油精炼、石油化学、钢铁及海运等可以说也属于这一类，或者是与此类有相似之处。当然，对工人发生影响的，除合理化以外，尚有其他许多因素。例如危机与萧条对工人的影响，在现在叙述的时期，也可以看到一些。再往后一年，即1961年9月紧缩开始后的时期，对于危机与萧条的影响，也必须予以极大的注意。

面对合理化对工人所造成的恶果，工会是怎样开展斗争的呢？就总评系统工会的情况来看，一般主要是事前协商，缩短工作时间等，具体地说，就是反对解雇、调换工作岗位、强化劳动、降低工资等，还有其它种种斗争。但是也不能否认，反对合理化的斗争往往是极为困难的斗争。

尤其是煤矿部门的问题牵涉面极广，各种因素又交叉重复，劳资双方的对立非常深刻。煤炭在战后初期被放在重新开始生产的中心地位上，受到国家周密的保护和援助，在以煤炭为中心的重点生产方式结束、道奇路线开始以后，煤矿部门便不受重视。这时，世界上以美国巨大的石油垄断资本为中心，在中东等地迅猛地扩大生产原油。世界的原油产量自1950年起到1961年为止的期间增加了约一点三倍。同时，由这些巨大石油资本组成的国际石油卡特尔，尽管内部历来有巩固的制度，仍由于生产过剩和非卡特尔成员的捣乱而难以维持，加上竞争激化，海上运输改善促使运费大幅度降低，从而后来原油的进口价格大幅度降低。这时日本经济

处于复兴时期，能源消耗大大增加，所以日本作为外国原油的重要市场，愈益引起国际石油垄断资本的极大关注。

对世界上这种形势的发展，日本与煤矿有关的垄断资本和工会，都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政府也没有制订日本独立的基本能源政策，可以说是“得过且过”地追随美国，以致对拥有三十万工人的煤矿业以及与煤矿业有关的许多部门和地区的人口，都没有采取负责的对策。因此日本的煤炭生产没有发展，其价格又高于石油，显然不适应随着经济急剧扩大而迅速增长的需要。与此同时，自由化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进口限制逐渐放宽，致使石油进口惊人地增加。1951年以后石油增加的情况是，1953年比1951年增加约一倍，1956年增加约二倍，1959年增加约三倍，而1961年一举增加约八倍。在石油进口量增加八倍的十年期间，煤炭的生产量仅从四千三百万吨增加到五千四百万吨，只增加了26%。

这样，在日本全部能源供应中，石油所占的比重从1951年的8.6%大幅度上升到1961年的36.7%，而煤炭则从53.6%大幅度下降到36.7%。煤炭所占的比重，1951年为石油的六倍，而在1961年终于同石油一样了。

不仅如此。煤矿业在据有优势的石油猛烈攻击面前，已不能继续维持过去的状态。为了重建煤炭工业，政府和垄断资本遂在1959年制订了合理化计划。根据计划，决定：（一）为与石油相对抗，到1963年煤炭价格每吨降低一千二百日元；（二）关闭效率低的炭坑，加强效率高的炭坑（即所谓的scrap and build），国家向效率高的炭坑投放资金；（三）在已经减到二十六万的矿工中，再解雇十一万人。这样的合理化，势必迫使工人起来进行激烈的斗争。但是，煤矿业非但未能重建，而且由于原油进口的急剧增加和重柴油价格的进一步降低，煤矿业陷入了更加深刻的困境，这就需要制订进一步的对策。

世界上出现了日益显著的石油胜过煤炭的倾向，其中日本的煤炭工业危机特别深刻，这主要是由于大量使用低工资劳动者的落后生产结构，煤矿垄断资本对石油的攻势完全采取放任态度，政府对煤矿工人的斗争只要不过分激烈，便加以敷衍，最后，总是使工人承受最大的牺牲。所有这些，都是日本垄断资本对美从属姿态的表现。

在这种形势下，三井矿山公司所属的三池煤矿，时刻孕育着爆发劳资冲突的严重危机。三池不仅是日本最大的煤矿，而且那里的劳资对立在战后已经持续了很久，相当尖锐。这个矿的工会最强，最有斗争力量。针对这种情况，三井矿山的资本曾考虑一举彻底解雇工会的活动家，以削弱这个工会的力量，进行合理化。于是，工会方面组织全国性的支援，资本方面包括三井集团在内的整个垄断资本，则都支援三井矿山，呈现出垄断资本要同工人阶级进行一场大规模决战的姿态。

从1959年初通知解雇六千名工人开始，公司方面逐渐加强了对工会的攻击，1960年初出现了关闭工场的情况，工会以无限期罢工进行反击，并与反对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结合起来。由于双方的冲突反复发生，对立极为深刻。在这期间，公司方面组织了第二工会，从而出现了许多工会会员分裂出去，三井矿山的三池煤矿以外的工会脱离这一斗争的事态，由于庞大的警察力量强行干预，以及暴力团的介入，还发生了工会会员被杀害的事件。最后，工人斗争失败，三池斗争也于1960年9月结束，合理化计划按照公司的方针被强制推行了。

在这以前，总评等工会对斗争的前景深为忧虑，认为这次大规模斗争如果失败，不仅日本工会运动会受到很大打击，而且工会运动也不得不全面后退。情况确实如此，三池的失败使三池工会受到很大打击，也使整个工人阶级遭受了一定的打击。但是，并

没有因此而造成整个工人运动的特大后退甚至瓦解。这是因为工人方面虽说失败了，但组织了大规模的斗争，真正发挥了它的威力。

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在斗争中工人内部发生分裂和出现了第二工会。战后发生了大规模斗争的日产汽车公司(1953年)、日本制钢公司的室兰工厂(1954年)、王子造纸公司(1958年)以及三池煤矿(1959年)等，大多数都出现了第二工会，最后是以工人失败而告终。日产汽车公司工会的分裂，使全国性组织全国汽车工会瓦解，造成了汽车工业实行低工资的局面。第二工会多数是由公司方面出钱组织的，而工会分裂，多数工人转向第二工会的根本原因还在工会方面，特别是工人运动内部的领导有问题。

7. 农业基本法及其背景

前面已经说过，农业就业人数的减少至迟是从1954年开始的，过了1955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这种倾向就更加明显了。从国势调查的结果来看，自1955年到1960年期间，农业人数从一千四百八十九万人减为一千三百二十二万人，减少了一百六十七万人。在1961年农业就业人数进一步减少，据农林省估计，减为一千三百零三万人。农业人口从此开始大批外流，仅1961年就达七十二万人。

由于从农村外流的庞大人力主要都是新毕业的和年轻力壮的青年男女，农业就业人口中家庭主妇和老人占的比重较高，出现了“妇女和老年化”现象，因而农业劳动力日益削弱。

由于人手不足，农村劳动工资明显高涨，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农业技术装备的改进和投资的扩大，但也产生了农地狭窄、经营分散，使资本装备和投资的效率明显减弱的矛盾。另一方面，由于农户的农业支出增加，加上来自外界的影响，农户的家庭开支也增

加了。为了弥补这种农家开支，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产品的生产，提高农产品的价格，但仅此仍嫌不足。因此，近年来农民对兼业收入或非农业收入的依赖程度逐年提高。即使这样，农户的收入与产业工人相比，一般地说还是低的。所以农业人口向其他产业流动的情况进一步增加。

农业人手不足，导致了投资和开支的增加，而分散的小农户仅仅依靠农业来筹措资金是越来越不可能了。因此，完全依靠农业的农户，其经营的最小规模一直在扩大，1955年是一点五町（日本面积单位，合一公顷），到1960年提高到二町（摘自《经济讲座》1963年3月号所载小池基之论文《所谓高速度增长的农业》）。据统计，耕地规模为二至五町的农户数量在显著增加，其它规模者在减少或处于停滞状态，总的看来，经营规模扩大的农户是少数，而缩小的农户是多数。特别是规模未满足三反（日本面积单位，合零点三公顷）的农户正在显著减少。脱离农业的农户，90%是耕地不到五反的零散的兼业农户。零散的兼业农户脱离农业的趋于增加，但数量还是比较小的。因而，兼业农户很少放弃土地，尽管农业人口和农村就业人数大幅度减少，农地集中的趋势在当时还是进展极慢。

如上所述，农业愈来愈被其他迅速发展起来的产业所抛弃。其他产业的发展，特别是这些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大幅度增加和工资的提高，加强了农业人口外流的倾向，使农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情况既缓和了战后特别突出的农村人口过剩问题，也给农业带来了相当坏的影响。而自由化问题，又给农业造成了新的困难。

这样，农业受到来自外部的极大影响，根基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确保农业的自立性？具体地说，如何防止农业和其他产业收入的差别扩大并缩小这种差别？这是一个极其困难的课题。作

为这一问题的基础对策,在1961年制定了农业基本法。其根本点在于改善农业的经营结构。要改善经营结构,就必须扩大经营规模,而现在农地这样狭窄,即使是目前尚能自立经营的农户,有很多不久就不可能继续自立经营。于是采用了农业经营协同化^①的办法来扩大经营规模,确保自立经营的体制。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一般地说是不能实现的,即使有一小部分能够实现,困难也不小。另一方面,在农村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倾向,即其他产业的垄断资本积极向农村扩张,直接掌握农业,大量采购加工用农产品。加上今后预定要实行的农产品自由化的影响,日本农业面临着既紧迫而又不容易解决的几个问题。

8. 过量的设备投资和外汇危机的重新出现

如上所述,日本政府害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日本向第八条国过渡,千方百计要求该组织推迟提出这一劝告,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因日本的国际收支开始恶化,暂不提出这一劝告。

但是,自由化计划提前实行,结果是对企业加速采取自由化的对策。由于上年夏季以来“倍增热”带来的景气上升,多数企业获得了莫大的利润。尤其是在电机工业、汽车工业垄断资本以及与电子工业、摩托车有关的新兴资本中,有数家的利润率(资本金对利润的比率)年率竟达100%到170%。在石油冶炼部门,美国系统富有实力的公司的利润率也有超过120%的。在这些公司中,有好几家的一年利润总额超过一百亿日元。

设备投资也是以1959年据首位的机械工业(包括电机和汽车等部门)为首,其后以石油化学工业及钢铁业、合成纤维工业等为主力,以猛烈的势头增加着(参看第13表)。这样的投资热,在

^① 农业协同化即要求农民普遍加入“农业协同组合”。参看第90页译注。——译者。

第 13 表 设备投资的增加和主要部门在设备投资增加中所占的比率

| (a) 民间设备投资实际增加额 | | | | | |
|-----------------|--------|--------|--------|--------|--------|
| | 1956年 | 1957年 | 1959年 | 1960年 | 1961年 |
| | 499亿日元 | 330亿日元 | 500亿日元 | 896亿日元 | 832亿日元 |

| (b) 主要部门在民间设备投资增加额中所占的比率 | | | | | |
|--------------------------|-------|---------|-------|-------|-------|
| | 化学15% | 钢铁21% | 机械20% | 机械23% | 机械22% |
| | 纺织 14 | 化学 20 | 钢铁 19 | 化学 16 | 化学 19 |
| | 电力 12 | 机械 18 | 化学 17 | 钢铁 12 | 钢铁 9 |
| | 机械 12 | 电力 18 | 纺织 6 | 电力 11 | 纺织 4 |
| | 钢铁 8 | 纺织(-)13 | 电力 2 | 纺织 4 | 电力 3 |

(备考) (a)和(b)根据个别调查的资料。

(a)根据1961年度《国民收入白皮书》中的资料计算,价格为1955年度的价格。

(b)根据日本开发银行资料计算。

1961年上半年曾一度有所减低。但是乐观的增长气氛,加上对自由化逼近的危机感。这两种因素的混合,又导致了爆炸性的设备投资热。于是景气明显地出现了过热状态。

1961年民间设备投资比上年增加约38%,约达三万九千亿美元,收入倍增计划第一年的设备投资额与第十年的最后投资目标几乎相等(实际金额相当于第一年的96%)。随着设备投资的激增,机械的进口和与扩大的设备相应的原材料的进口,也急剧增加。这年的进口约增加十三亿美元,贸易收支一下子出现十五亿美元的逆差,6月份的外汇储备曾超过二十亿美元,年末则减少到十四亿美元。

1961年内消费物价上涨近一成。另一方面,同年4月实行自由化的棉花和羊毛以及接近实行自由化的石油制品等(包括棉制品、毛纺织品、重柴油、汽油)多数商品陷入生产过剩,价格开始

下跌。其中特别是与纤维、石油有关的商品，受自由化的影响，价格暴跌。

实行收入倍增计划的第一年度，以上述设备投资为首，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工业生产规模和其他各种重要方面，与实际情况都有很大出入。同时，消费物价也大幅度上涨。制订收入倍增计划的目的之一，是在避免景气过热和国际收支出现赤字的限度内，尽可能实现较大而稳定的增长。但是，计划的头一年很快便出现了景气过热和国际收支的大量赤字。因此，收入倍增计划的原来目的，在最初的一年就打乱了。

为了抑制景气过热和压缩投资，摆脱外汇危机，政府开始加紧紧缩金融，限制进口，景气从1961年9月起进入了所谓调整时期。在生产设备大规模扩大的情况下，经济危机开始了。

* * *

为寻求一个“排泄口”来排泄由于大幅度扩大生产能力而造成的生产过剩，乃强行增加出口。这样一来，国内的生产过剩和外汇危机总算得到克服，危机也到了底。所以在1962年10月取消了紧缩政策，景气开始缓慢回升。

1962年以后，日本经济进入了“转换时期”，这一流行语在“经济白皮书”中也沿用了。所谓“转换时期”是指，以猛烈增加的设备投资为主导的经济扩张时期已经告一段落，此后支撑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将是个人消费和政府开支，这从景气循环上说是转折性的变化，故名之曰“转换时期”。对于今后的经济增长率是否降低，说法不一，但一般认为多少要有所降低。尽管如此，与美国和英国相比，日本经济仍然显示了较高的发展速度。但是，过去数年的高速增长如果持续下去，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危险，而且由于实行自由化、加入经济合作发展组织以及美国保卫美元这些来自外部的影响，爆发这种危险的可能性更大。不过，从

1962年以来到目前为止，日本经济的变化经历的时间毕竟还很短，要对其作出正确的考察和判断，我认为为时过早。因此，我的这本战后日本经济史，写到1961年秋经济危机发生，只好暂时打住。现在回过头来，再概括地补述一下战后十六年间的日本经济情况。